



名于一世的教育家张栻

张建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传道济民：

名于一世的教育家张栻

张建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道济民：名于一世的教育家张栻 / 张建东著.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5

ISBN 978 - 7 - 5161 - 8230 - 7

I. ①传… II. ①张… III. ①张栻 (1133—1180)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 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957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秦 婵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75
插 页 2
字 数 269 千字
定 价 68.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有宋一代，虽内忧外患频于其他王朝，然并非“衰世”，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并对学界影响深远的“唐宋变革”论即是明证。的确，这是一个社会全面变革的时代，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与转型，最终造就了辉煌一时的两宋文化。对此，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大师无不予以高度认可。王国维称两宋“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则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如此造极之世的背后，则是以各个领域灿若群星般精英们的贡献为底色。然一直为学界津津乐道的，自然是有宋一代理学的崛起及理学家群体的智慧。

理学自周敦颐开山，至朱熹集其大成，再到宋理宗时成为官方学说，历时二百余年，期间学派林立，名家辈出。理学家们怀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纷纷以私学、书院等为阵地，积极建构学派理论，无论居官为民，皆倾力践行理之终极关怀之责任。理学的产生及其不同学派之间的争鸣激荡，可谓继“轴心时代”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学术思想大奔流期，且二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轴心时代”生成的儒家思想被汉朝统治者推上官方哲学，而作为“轴心后时代”衍生出的新儒学即理学，被南宋统治者同样推上官方哲学地位，仅此足以表明理学家贡献之大及理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之殊。故而，有关两宋理学及理学家的话题，总有说不完道不尽之嫌。

谈及理学的流变，我们绝不能忽略被时人誉为“一代学者宗师”的张栻。作为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张栻的学术地位几与同时代的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理学大师比肩而立。他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一向恪守“传斯道”之教育宗旨，秉承“济斯民”之社

会理想，所培育出的弟子大都精于经世致用之学，具有务实的态度和高尚的品质，尤其在国家危难之际，纷纷投笔从戎，表现出极可贵的爱国情操。张栻虽英年憾逝，但其超凡入圣的人格学识、独树一帜的教育思想、匡济天下的入世品格不仅完美诠释了一代学人“止于至善”的崇高精神境界，还泽被后世、化及千年，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已往对张栻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哲学或理学领域，且因受传统学术研究一向追求“高位化”的影响，导致长期以来人们对张栻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一个理学家的张栻；陌生的是，也仅是一个理学家的张栻。鉴于法国年鉴学派史学观的促动，史界研究视野的逐渐下移，对张栻理学思想之外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见人不见行”、“见物不见事”的学术传统仍困扰着学界，从已有论著中，总让人难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张栻。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张栻与普通人一样，富于生活情趣，注重亲情友情，体恤宗族姻亲，而在教育、学术与政治舞台上，他却有着超越普通人的大思维大智慧。那么，如何将一代儒宗全景式地展现给世人，亟需研究视野及方法的转变。

当审阅过张建东博士的《传道济民：名于一世的教育家张栻》书稿后，心中颇为欣慰。著作作为第一部专门研究张栻教育思想、教育贡献的著作，暗合了当前学术发展的诸多趋势，部分内容足以填补张栻研究的若干空白。如他以张栻的“传道”、“济民”等活动和事迹为中心，充分借鉴社会史、生活史、身体史、心态史等领域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又尝试将西方史学倡导的“微观史学”和“深度描述”理论与中国传统历史叙事相结合，注重历史场景的构建和还原，深切关注到张栻的心理世界、情感世界、家庭生活及社会交往状况等诸多方面，对张栻波澜壮阔的一生作了立体、全景式考察，丰富了历史面相，还历史人物于血肉，以更为完整的研究维度逼近历史之真，力图开拓出教育历史人物研究的新范式。加上他将飞扬的文采融入行文之中，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建东有扎实的史学功底，自读博及毕业至今，笔耕不辍，尤在

两宋文化教育研究领域立论颇多，作为导师，欣慰之余，疾笔是为序。

周世宇

2016年7月9日于武汉东湖之滨

目 录

导论 两宋：一个师道复兴与士人主体意识空前觉醒的时代……	(1)
一 师道复兴	(1)
二 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	(10)

上篇 传斯道：张栻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活动

第一章 独树一帜：张栻教育思想探微	(23)
第一节 张栻教育思想的形成	(23)
一 承继家学	(24)
二 寻师问道	(27)
三 取友四方	(33)
第二节 张栻教育思想的特色	(50)
一 传道济民的崇高教育宗旨	(50)
二 明义利之辨的德育要旨	(53)
三 “居敬穷理”的德育方法	(61)
四 教育目的：明人伦、育圣贤	(70)
五 “明万事”的教育内容说	(78)
六 兼容并蓄的教学方法	(88)
七 小结	(105)
第二章 留意斯文：张栻的书院教育活动	(107)
第一节 时代场域：书院教育的兴起	(108)
第二节 设坛讲学	(113)
一 城南书院以道鸣	(115)
二 岳麓书院陶诸生	(124)
第三节 刊藏典籍	(134)

一 整理善本, 嘉惠后学	(137)
二 发展学术, 润泽四方	(145)
第四节 江湖鹄袍争骏奔: 引领书院游学热潮	(150)
第三章 张栻的日常生活	(158)
第一节 友情世界	(159)
一 交游活动	(160)
二 信柬往来	(168)
三 聚散两依	(170)
四 坦诚相见	(176)
第二节 念亲恤族	(179)
一 父子情深	(180)
二 手足情谊	(182)
三 对宗族与姻亲的关怀	(188)

下篇 济斯民: 张栻匡济天下的入世情怀

第四章 拳拳报国志	(195)
第一节 讴歌忠义, 鼓舞民众	(197)
一 以身许国: 少傅刘公的抗金事迹	(199)
二 一世忠义: 直秘阁詹公二三事	(205)
三 对其他古今忠义人物的颂扬	(209)
第二节 美芹十献, 痛斥议和	(214)
第三节 参赞军务, 攘外修内	(231)
第五章 涓涓济世情	(241)
第一节 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	(241)
第二节 排释抑道, 捍卫道统	(245)
一 佛学渊源	(249)
二 对释道的深刻批判	(252)
第三节 修举儒者之政	(258)
一 从政生涯	(260)

二 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	(271)
第四节 “护养邦本”的济民情怀	(273)
第六章 张栻的历史贡献及其影响	(281)
第一节 张栻的教育贡献	(281)
一 丰富了宋代理学教育思想	(282)
二 发展了宋代理学教育理论体系	(282)
三 其他领域的贡献	(283)
第二节 张栻对后世的影响	(284)

导论

两宋：一个师道复兴与士人主体意识空前觉醒的时代

宋代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教育领域，“宋代的太学和各地的州县学、书院蓬勃兴起，其中，书院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神宗时期太学创立的三舍升级制度，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首创，实为现代教育分级制的先河。教育分科更加细致合理，教育基本实现普及化。”^① 这是一个书香四溢、教育家辈出的时代：范仲淹、李觏、孙复、胡瑗、石介、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杨时、胡宏、张栻、吕祖谦、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他们灿若群星，群峰并峙，各擅胜场。宋代之所以会出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教育巨匠持续“井喷”的盛况，其产生的社会土壤和时代背景颇值得深入探讨。和前代相较，宋代文化教育领域彰显出两个重要的时代特征：一是自先秦、两汉以来，沉寂已久的尊师重教之风得到复兴；二是宋廷以儒立国，优渥读书人，士人群体主体意识空前觉醒，儒家学者匡世济民、教化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增强。这两个特征是宋代教育奏出绚烂华丽乐章的根本前提，它们互相交织、互为表里，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文化教育事业的繁盛。

一 师道复兴

范仲淹身陷某次严峻的政治漩涡之时，曾谆谆教导儿子范纯佑说：“我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② 因支持庆历新

① 王曾瑜：《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② 王得臣：《麈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标点本，第17页。

政遭贬的苏舜钦也自嘲曰：“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学教后生，作商贾于世，未必至饿死。”^①一代名相范仲淹竟在生死关头嘱咐儿子以教授为业，苏舜钦被贬后也打算靠“所学教后生”来谋生度日，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判断，教书育人在宋代读书人心目中已成为跻身仕途外最为理想的职业取向。与魏晋以来“不闻有师”的情况不同，宋代复兴并进一步弘扬了先秦、两汉时期的尊师重教之风，这一转变使得宋代的文化教育领域气象一新。

宋代是一个教师身份与主体意识空前凸显的时代，著名的“程门立雪”故事就发生在理学家程颐与学生杨时身上：“（杨时）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②这与魏晋以来的社会风气截然不同。宋人方勺曾在笔记小说《泊宅编》里记载了唐朝名相魏徵耻于言师的逸事：“王通隋末隐白牛溪教授，学者常数百人。唐将相如王、魏辈皆其门人也，既显，绝口不道其师，此何理哉！”^③方勺批评魏徵等唐朝名臣不尊师行为固然带有非古褒今的情绪，但基本上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柳宗元对这种长期存在的不正常现象很无奈：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④

为何出现魏晋以来“不闻有师”的局面，柳宗元并没有给出答案。其实，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的学术风气息息相关。如魏晋时期，门阀士族把持政权，他们强调门第，排斥寒俊之士，“举贤不出

① 《苏舜钦集》卷16《与欧阳公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标点本，第222页。

② 《宋史》卷428《杨时传》，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2738页。

③ 方勺：《泊宅编》，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第53页。

④ 《柳宗元集》卷34《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本，第871页。

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其子弟即使不学无术也有似锦的前程。而且，儒学此刻已发展到讖纬化、神学化阶段，其烦琐、僵化的特征也迫使自己走向穷途末路，读书人对其研读、探讨的兴趣大减，因此，由于上层社会的不学无术、寒士仕途的壅塞以及儒学自身的原因，社会各阶层对读书受教的热情普遍不高，师道不存也在情理之中。再以唐代为例，唐代虽处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但经学却仍处于衰落期，社会及科举取士中对诗赋的空前关注使经学备受冷落。经学最重师承，而诗赋则注重个人的天赋、才情，对师长需求较弱，因此唐人冷落教师行业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有宋一代，统治者以儒治国，重振儒术，科举考试内容也由诗赋逐渐转向经术和策论。在经术的考察中，传统的注疏也被能自由发挥的义理之学所取代。义理之学的兴起对师道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它使经学的研习带有浓厚的意趣与思辨成分，极大地提高了儒士们钻研经籍的积极性，义理需透过经籍文字的表面去深入探究，还要联系修身治国的实际，因此，义理之学还具有浓郁的个性化色彩，注重经籍的理解和发挥，故求教名师、师友切磋的必要性大大增强，举国学风也为之一变。欧阳修面对这一变化时指出：“国家自兴建学校以来，天下学者日盛，务通经术，多作古文，其辞义可称，履行修饬者，不可胜数。”^①同时，经学的师承性也要求每个读书人都需师出有门，因此随着经学的复苏与发展，儒士们出于科举或研习经术等方面的需要，不惜千里迢迢负笈寻师，他们聚集在一批名士硕儒身边，服膺其人品学问，社会上也逐渐掀起了尊师重教的热潮：“庠塾崇师道，乡闾重典刑。”^②陆九渊对此深有体会，并赞曰：“秦汉以来，学绝道丧，世不复有师，以至于唐，曰师、曰弟子云者，反以为笑，韩退之、柳子厚犹为之屡叹。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③

① 《欧阳修全集》卷111《修约举人怀挟文字劄子》，中华书局2001年标点本，第1677页。

② 傅璇琮：《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86页。

③ 《陆九渊集》卷1《与李省干》，中华书局1980年标点本，第14页。

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是较早呼吁弘扬师道的学者。欧阳修曾回忆道：“师道废久矣，自明道、景佑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与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①如胡瑗教授湖州时，“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被聘太学后更不遗余力地倡导师道尊严，效果十分明显：“随才高下，喜自修饬，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瑗弟子也。”^②石介也经常向自己的学生灌输尊师的重要性：“古之学者，急于求师。孔子，大圣人也，犹学礼于老聃，学官于郯子，学琴于师襄，矧其下者乎！后世耻于求师，学者之大弊也”，并亲自作《师说》以喻学者。大儒孙复“举进士不第”后隐居泰山聚徒讲学，以治《春秋》名扬天下，石介率弟子张洞“北面而师之，访问讲解，日夕不怠”，并执弟子礼甚恭：“明复行则从；升降拜起，则执杖屦以待。二人者，久为鲁人所高，因二人而明复之道愈尊。于是学者始知有师弟子之礼。”^③石介、张洞为弘扬师道、重振儒家师礼以身作则，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尊师行为对士林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又如胡瑗高足倪天隐：“学于安定，所述《周易上下经口义》十卷，又《系辞上下》及《说卦》三卷，盖安定讲授之余，欲著而未逮，先生述之，以非其师之亲笔，故不敢称《传》而名之曰《口义》。”^④倪天隐将胡瑗的学术思想发扬光大，著述了十多卷相当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但他出于对老师的敬仰，并不敢居功自傲，仅仅以“口义”命名。宋初三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使沉寂已久的师道尊严在宋代又迅速复苏，“自是天下之人始知尊德而隆师，士皆知仁义礼乐之说为足以诚身而格物”。

在宋初三先生之后，支持恢复师道的呼声逐渐高涨，周敦颐、范仲淹和程颢就是其中的重要引领者。周敦颐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家，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他曾奔走于洪州分宁县（江西修水县）、袁州芦溪

① 《欧阳修全集》卷25《胡先生墓表》，中华书局2001年点校本，第389页。

② 《宋史》卷432《胡瑗传》，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2837页。

③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补遗），中华书局1981年标点本，第130页。

④ 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55页。

镇（江西萍乡市）、合州（四川合川市）、江州（江西九江市）等地，积极设坛讲学。周敦颐认为兴教育、立师道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在教学中，有学生问他“何为天下善”，周敦颐严肃回答：“师”，教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性有刚柔、善恶之分，“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①他还认为师友可用道义感召世人，引导人们扬善弃恶，由愚昧走向聪慧，“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范仲淹对教诲过自己的胡瑗、孙复等恩师十分崇敬，他经常告诫身边的学者说：“学者当有所宗，某自受教于翼之先生（胡瑗），不敢有非僻之心。”^②程颢在《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劄子》中对宋兴百余年仍“师道不立”的不正常现象深感不安，他指出：“宋兴百余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尽美，士人微谦退之节，乡间无廉耻之行，刑虽繁而奸不止，官虽冗而才不足者，此盖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尊，无以风劝养励之使然耳”，基于这一社会现实，他进而向宋神宗谏言曰：“窃以去圣久远，师道不立，儒者之学几于废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则不日而复。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师学不正，则道德何从而一？”^③程颢倡导建学校、尊师儒的主张切中时弊，为尊师重教风尚的进一步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舆论氛围。在一大批名士硕儒的积极推动下，社会上僧道、巫、医、百工等各行各业也纷纷掀起尊师风潮。如陈师道在《后山谈丛》里记述了一位叫怀禅师的高僧，“每住持，必舍讲《师说》，使其徒听焉”，他对怀禅师的举动十分赞赏，并因此感叹曰：“学其可废乎！”^④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师道复兴的过程中，宋廷和官僚士大夫的垂范作用也不容忽视。宋代帝王除大力敦奖儒术、尊孔、祭孔以及设经筵之制外，还用实际行动弘扬师道，典型莫过于宋太祖与其蒙师幸

① 《周敦颐集》卷2《通书》，中华书局2009年标点本，第21页。

② 曾敏行：《独醒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标点本，第40页。

③ 《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标点本，第448页。

④ 陈师道：《后山谈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标点本，第24页。

文悦之间的故事：

幸文悦，后周通经史里儒。太祖幼尝从其学，……与文悦久不相见，上每亦念之。……是夕，太祖亦梦其来，令左右询访，文悦惠然饰巾至门矣，上大异之。后迁员外郎。^①

宋太祖对自己的蒙师尚且日思夜念、恩宠有加，充分显示了他对师道古礼的尊崇。同时，许多官宦名臣在成功入仕后，回忆起自己艰难的求学经历时，也往往感触良多，深忆师恩：“怅念青春家塾日，共闻规训有源流。”^②如丁度官至宰相后专意回乡探望幼年蒙师：

童韶时，尝从老郁先生学。至是，首入陋巷，诣先生之居，以两朱衣掖之，拜于其下。先生惶惧，大声呼之曰：“拜杀老夫矣。”既坐，话旧极款密，且云：“小年狭劣，荷先生教诲，痛加榘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赐也。”^③

丁度贵为宰相之后不忘蒙师“老郁先生”教诲之恩，并专程回乡感谢师恩，从二人“话旧极款密”推测，当年师徒之间的相处还是颇为融洽的。训诲过众多名士硕儒的著名教育家邵雍晚年疾病缠身，司马光等众多学生朝夕侍奉：

雍疾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将终，共议丧葬事外庭，雍皆能闻众人所言，召子伯温谓曰：“诸君欲葬我近城地，当从先茔尔。”既葬，颢为铭墓，称雍之道纯一不杂，就其所至，可谓安且成矣。^④

① 文莹：《玉壶清话》，中华书局1997年标点本，第29页。

② 傅璇琮：《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83页。

③ 龚明之：《中吴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标点本，第20页。

④ 《宋史》卷427《邵雍传》，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2728页。

司马光、张载、二程均是震古烁今的儒学大家，他们因服膺邵雍学问人品而环伺其病榻前直至安葬，程颢还亲为恩师写下墓志铭，可以想象邵雍临终前是多么的志得意满！像宋太祖、丁度、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等帝王与官宦名士的尊师言行在宋代文献中有相当多的记载，他们弘扬师道的礼仪之举对全社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垂范意义。

在宋廷大力倡导以及官僚士大夫的积极推动下，尊师重道之风在民间社会也逐渐深入人心，宋代读书人自学童之时就常常被灌输隆师理念：

山谷（黄庭坚）《送秦少章从苏公学》云：“斑衣儿啼真自乐，从师学道也不恶。但使新年胜故年，即如常在郎罢前。”后山（陈师道）云：“士有从师乐，诸儿却未知。欲行天下独，信有俗间疑。秋人川原秀，风连鼓角悲。目前豚犬类，未必慰亲思。”……颜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饮，在人不堪忧之地，而其子乃从其师周游天下，履宋、卫、陈、蔡之厄而不以为悔。此岂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义哉！盖诚使此心无所放失，无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无伤焉，则千万里之远，无异于亲膝。^①

黄庭坚和陈师道均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他们站在民众的立场，在各自的诗句中生动描述了宋代社会从幼童到普通士子纷纷“从师学道”的情形，并深得其乐。宋人还以颜回“从其师周游天下而不悔”为例，指出尊师能使人“知义”，人心“无所陷溺”，即使在求学中与家乡相去千里，仍能感受到“无异于亲膝”的充实和温暖。

当然，宋代从乡党之学逐渐弥漫到书院、官学甚至整个社会的“师弟子之礼”，也易造成不同学派的门户之见，进而出现“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的不良局面。中国自古以来，

^① 罗大经：《鹤林玉露》，《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标点本，第5244页。

文人儒士就有以门生故吏为群体的朋党意识，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中唐的牛李党争等都是这一意识的集中体现。这种传统也在儒学重振的宋代社会迅速发酵，不同学派因学术观点不同而互相辩难，弟子之间也难免出现互相攻讦的现象。如胡瑗与孙复在太学执教时，就因学术观点有分歧而互不往来：“（孙）复恶胡瑗之为人，在太学常相避。”^①而弟子一旦服膺某位名师，再师承其他学者则会有背叛师门之嫌：“李先之、周恭叔皆从伊川学问，而学东坡文辞以文之，世多讥之。”^②学派的争鸣与政治的纷争，往往又会交织在一起而互为表里。宋代党争频仍，如北宋的新旧党争、南宋的庆元党争等，师道复兴而引起的门户之见也应难辞其咎。但是，由于宋政府认真汲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采取多种有效手段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如禁止科举及第者称呼主考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③科举考试实行殿试制度等等，而且自北宋后期始，“学术上的师承，和宋学家提倡的‘道统’一起，已逐渐形成了一股某种程度上超越政治权力的文化力量”，^④许多儒学大师已能够意识到并超越狭隘的门户之争，摒弃学术偏见，互相交流借鉴，不同学派也如涓涓细流，逐渐汇流成河，并最终促生了集宋学之大成、影响中国千余年的新儒家学说——理学。

还应注意的是，儒生士大夫力主复兴师道，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中国自汉晋以来，习惯运用汉儒董仲舒创造的“天人感应”理论来警示和约束皇权，但到了唐宋时期，由于粗糙烦琐的“天人感应”理论已渐渐落伍于时代，通过天地间祥瑞灾异的解释限制皇权的方式已渐渐失去效用，富弼曾就此感叹曰：

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本，第4495页。

② 丁传靖：《宋人軼事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53页。

③ 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标点本，第4262页。

④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第147页。